

「洋涇浜學風」舉凡



近來，大陸學術界出現了某些脫離具體社會、歷史內容的「新趨勢」。對此，劉東將其稱為「洋涇浜學風」，可謂一針見血又實事求是的概括。這種「洋涇浜」的本質特徵就是脫離社會歷史經驗，並以事實、經驗強就某種「理論」。

今舉兩例。一是對文革時期紅衛兵美術的評論。有論者僅從某種形式上的「相似」就用西方「後現代藝術」、「波普藝術」來詮釋附會「文革」中的「紅衛兵美術運動」^①。作者抽掉(或扭曲)了具體的內容和背景分析，認定「紅衛兵是叛逆者，具有強烈的造反精神，顛覆既定的美術秩序是他們的必然行為」。叛逆、顛覆是西方「後現代」理論(包括哲學、文學、藝術、乃至整個價值世界)的核心內容，這樣，似乎很可以在「紅衛兵」與「後現代」之間抽象出一種思想上的「文脈」。

實際上，如果對紅衛兵運動的過程和性質多作一些了解就會知道，紅衛兵的本質恰恰不是「叛逆」和「顛覆」，而是認為既定的秩序還不夠穩定、不夠鞏固，「專政」、「鎮壓」(一元化)得還不夠嚴厲，因此要用血淋淋的「紅色恐怖」來保證黨／主席的絕對權威、絕對一元化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萬年紅」。甚至根據「無產階級審美觀」，用皮鞭和剪刀統一全民的褲腳尺寸、服裝式樣、頭髮長短等等，而這與以「多元」為宗旨的西方的「後現代」有本質上的不同。

紅衛兵對美術權威和美術組織路線的猛烈批判和衝擊，恰恰是認為這些權威和組織背叛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威脅既定秩序的「黑線、黑幫」，是散布「封、資、修」的毒素，目的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早在文革前，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幾次談話和〈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就已在後來成為紅衛兵發起者的高幹子弟中傳閱。〈批示〉怒指文化部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各類文藝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

團體」。文革開始後，這些批示作為「光輝文件」公開發表，成為文藝界、也是紅衛兵「大批判」的「光輝指導」。

紅衛兵的「造反」實際上是「奉旨造反」，後面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支持和指揮，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作為「堅強後盾」。對此，紅衛兵的綱領性文件、紅衛兵的發源地之一、毛澤東親自去信表示支持的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造反宣言也說得明明白白：「我們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你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裏。」^②所以他們才能肆意打、砸、搶、抄、抓，直至草菅人命。這種「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裏」而「仗勢欺人」的嘴臉，可是西方「後現代」所沒有的。所以也談不上「美術界紅衛兵與毛澤東的思路一致」和「紅衛兵美術向官方美術轉化」，因為紅衛兵的整體並沒有自己獨立的「思路」，幾乎所有的紅衛兵組織都宣誓「生當毛主席的紅小兵，死當毛主席的紅小鬼」，壓根兒就是按照毛澤東／中央文革／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戰略部署」行動的。用紅衛兵的語言來說，就是「紅司令指向哪裏，紅衛兵就衝向哪裏」。「紅衛兵美術」就是當時(也可說是唯一)的「官方美術」，《毛主席去安源》的產生，只是再次證明了這一點。那些漫畫代表着「破」，「去安源」則代表着「立」，合成「破舊立新」的「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在美術領域的體現。

至於對油畫的批判少於對中國畫的批判，主要還是因為在文革前油畫的影響要比國畫小得多，所以「消毒」的重點自然在中國畫。但是，對油畫中的俄國「巡迴展覽派」還是有着嚴厲的批判。因為「解放後」，歐美派早就被「掃入垃圾堆」，油畫界是「俄蘇派」的一統天下。但從「反修」後，俄蘇派也被認為仍不夠「紅」，直到文革中也被視為「修」而遭批判。而對歐美的現代藝術因為鎖國而幾乎毫無了解，所以除了重複「反映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沒落、頹廢」外，根本說不出一句有意義的話來。同樣，文學界的批判重點也是俄蘇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洛夫、蕭洛霍夫、西蒙諾夫，而不是歐美的喬伊斯、卡夫卡、海明威。這倒不是他們存心要對歐美作家網開一面，而是後者幾乎不為人知，毫無影響，也就沒有必要進行「消毒」。

不論性質如何，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往往都會產生大量誇張的宣傳畫，用以「煽情」。世紀初中國的義和團、俄國的十月革命、納粹德國，都產生了大量的宣傳畫。尤其是德國法西斯，堪稱此中高手，其形式足與「紅衛兵美術」媲美。這些宣傳畫的共同特點都是「將觀眾看為公眾整體或群體，而非單個的藝術觀眾」。照此說來，義和團的活動也可以看作是「後現代」的「波普藝術」、「環境藝術」或「行動藝術」了(許多義和團民經常身着戲裝臉化濃妝，自稱是某一傳說人物，如關羽、張飛、趙子龍、樊梨花、鐵拐李、孫悟空、豬八戒等，進行宣傳鼓動甚至戰鬥，真可謂「後現代行動藝術」的先鋒和典型)。

第二例為所謂批判理論與中國文學研究。有學者由法國「後現代」大師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淵源追至法國「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又由阿氏的思想淵源追蹤到毛澤東晚期思想的影響，進而

不論性質如何，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往往都會產生大量誇張的宣傳畫，用以「煽情」。義和團、十月革命、納粹德國都產生了大量的宣傳畫。尤其是德國法西斯，堪稱此中高手，其形式足與「紅衛兵美術」媲美。

對毛的晚期思想和文革理論大加讚頌，並由此對他人指出其捨棄中國具體經驗的批評不屑一顧，反譏之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翻版」^③。這就是說，在他看來許許多多中國人的生命血淚、悲歡離合，甚至整個中華民族經歷的巨大歷史性災難這種「經驗」及其在這種經驗上形成的對文革的否定性理論，都不如一位法國學者對中國、對文革的一知半解來得可靠和重要。作者自稱「新馬克思主義」（其實完全來自「西馬」，大約是認為「西馬」有「後殖民」之嫌而改稱「新馬」）或「批評理論」，承認「西方馬克思主義兩面作戰，對蘇聯東歐官方意識形態的列寧和斯大林主義以及蘇聯極權主義政治作激烈批判。當代批評理論對於資本主義和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兩種意識形態都採取批判、否定的態度」。但為何「西馬」的理論家們一方面批判蘇聯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另一方面卻稱頌中國毛澤東的文革？原因就在於他們對蘇聯的了解要比對中國的了解多得多。30年代，西方的左派知識份子，不也把理想、希望寄託於蘇聯、斯大林身上麼？隨着斯大林真相在50年代的揭露，他們才對蘇聯感到失望，轉而尋找另一個與自己所處社會不同的理想寄託之處，作為批判的參照物。對所處社會的不公和罪惡進行剖析和批判，這是「西馬」「批評理論」所取的令人欽佩的態度，也是處於其他社會的知識份子所當取的態度；而不應是有意無意地「反其意而用之」，加強權勢、中心、主流對弱勢、邊緣、支流的統治、擴張和衝擊。

對某些學者來說，整個中華民族經歷的巨大歷史性災難及其在這種經驗上形成的對文革的否定性理論，都不如一位法國學者對中國、對文革的一知半解來得可靠和重要。但為何「西馬」的理論家們一方面批判蘇聯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另一方面卻稱頌中國毛澤東的文革？

如果說「西馬」因對中國毫無了解而將斯大林、毛澤東對立並批斯崇毛尚情有可原，而剛離開中國才不幾年的「新馬」卻也跟着「西馬」亦步亦趨地如是說，豈不悲哉！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不就是有感於蘇聯的非斯大林化，丟了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中的一把而「變修復辟」了麼？文革的目的不就是要「反修防修」、揪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麼？不就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教訓，認為他專政、極權得還不夠，放鬆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尤其是放鬆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和專政，所以要進行「文化大革命」、要在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領域實行全面專政的麼？所以，毛的文革只是斯大林主義的進一步（更極端）發展。這些本是當時「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講了十餘年的「經典理論」，怎麼剛一跨過太平洋就把這「年年、月月、天天」全部給忘得一乾二淨？這種態度，才是「對中國『現代性』問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的理論、歷史與現實的「迴避」和「繞開」。不，不僅僅是迴避和繞開，而是有意塗抹。為了「塗抹」，甚至把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與索爾仁尼琴(Aleskandr I. Solzhenitsyn)等相提並論，認為「其道德力量、理性風範，絕不在沙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之下（當然以揭敵手之短為己任的西方輿論，是從不會將喬姆斯基與沙、索相提並論的）」^④。喬氏當然值得尊敬，但問題不在於喬、索等個人的品德比較，而在於兩種社會的本質不同。喬氏能義正辭嚴地批判這個社會而不被剝奪教職，依然可在他的書房和講壇思考著述、放言讌論而無流放、監禁之虞；而索氏所處的那種類型的社會則是稍有不滿就被流放古拉格或牛棚，甚至有殺身之禍。只有在相同的處境中，即都面對牛棚、勞改營、死亡的威脅時，才有可比性，才

能進行這種比較。這再次說明，抽掉具體內容、背景的「比較」何其謬矣。有意把舒適的教授書房與血淋淋的勞改營、牛棚相等，其用意自然是為了塗抹後者的血迹。

最近，我在翻閱舊紙堆中扒出的《國人對於日軍佔領新島後之感想及希望、新加坡陷落為大東亞建設之樞紐論文集》(以下簡稱《論文集》)一書，格外地引起了我的興趣、感慨。

這本《論文集》由汪偽政權組織的「中華民族反英美協會」於1942年5月編輯出版。據說是由「數千餘件」應徵稿中「精選」而出，共19篇文章，近20萬字。這19篇文章篇篇都對「皇軍」／「友軍」從奇襲珍珠港到攻陷新加坡的赫赫武功大唱讚歌，並聲稱中國要與日本協力合作，以完成大東亞戰爭的使命^⑤。令人奇怪的是，為甚麼這類明知會遭國人深惡的漢奸文字卻又能如此理直氣壯呢？原來，所有的文章作者都是以「大東亞戰爭」是黃種人反對白種人數百年殖民統治的解放戰爭這一冠冕堂皇的「反對殖民主義」為其「理論基礎」的。

這些文章認為，「這一次的大東亞戰爭，不單是日本對於英美的戰爭，是黃色人種對白色人種的解放戰，是亞細亞各民族，對資本主義，侵略國家的總動員戰爭」^⑥；也是「弱小民族解放」的先聲，代表了民族解放的洪流。這些文章篇篇都歷數了以英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為代表的白種強勢文明，幾百年來欺壓黃種弱勢文明殖民、半殖民、次殖民統治的種種罪惡，強調自鴉片戰爭以來其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壓迫和剝削，而「大東亞聖戰」的威力，就是要證明「西洋人所流行的，只有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是天之驕子，而其他民族則是命定的奴隸的觀念，完全是錯誤的。……此後白色人種的優越感，將成為沒落的觀念，而『殖民地制度』也失掉了合理的解釋」^⑦。在這一種邏輯中，中國的抗日戰爭則被指為是英美殖民主義的一部分，像「焦土抗戰」、「抗戰建國」、「長期抗爭」、「游擊戰爭」等，都是由於「依存英美之錯覺抗日排日之謬誤」而提出的「誤國口號，害民名詞」^⑧。

文集中還有不少文章對英美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大加鞭撻，認為「國人又炫於英美自由主義文化，酷慕其皮毛，不惜將數十年固有道德，棄之如敝屣，遂使人欲橫流，倫常失紀，戾氣所積，國勢日替」^⑨。現在「西洋人尚以為西洋文化是人類最高級的文化，而我們由於東方文化的不注意與不統一，只有在西方文化之前低首下心，但今後，在日本清算了追隨歐美的思想和政策，中國轉變了爭取民族解放獨立的路線，東方文化，將由此戰爭為契機，而在世界文化上放射新的異彩」^⑩。

讀着這些慷慨激昂的「反殖檄文」，不禁突發奇想——如果抽掉或無視具體的、有血有肉的歷史內容和時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造成巨大災難，而僅僅從理論到理論，從思想到思想，從文本到文本；以「後理論」證「前理論」，以「今思想」證「昨思想」，以「新文本」證「舊文本」，從中找出兩者的某些類似，那麼，我們今日可以拿時下頗為流行的「後殖民」理論來論證、詮釋當年「大東亞聖戰」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同時，很可能得

如果說「西馬」因對中國毫無了解而將斯、毛對立並批斯崇毛尚情有可原，而剛離開中國才不幾年的「新馬」，卻也跟着「西馬」亦步亦趨地如是說，豈不悲哉！怎麼剛一跨過太平洋就把這「年年、月月、天天」全部給忘得一乾二淨？

出當年中國、東南亞人民對日浴血抗戰卻原來是「維護白種強勢文明對黃種弱勢文明殖民統治」的結論。顯然，這是極其荒謬，不可接受的。

所以，如果脫離具體的內容和背景而對某種理論進行一種「純理論」、「純形式」的分析梳理，很可能會得出一些荒誕不經的結論；而當這種作為研究對象的理論本身具有強烈的社會政治內容的時候，則不僅荒誕，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一種社會理論總是從具體的社會現實中抽象而成的，因此都有一定的限定性；但由於是一種抽象，又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和普適性，所以才能把一種「社會理論」運用到另一個社會中去。然而，當我們把某一種社會理論運用到另一個社會的時候，極易忘記這一理論抽象的背後所蘊含的某些特定社會內容和提出的特定問題，而簡單將其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於是就會「直把杭州當汴州」，就會把「西馬」、「批評理論」、「後現代」、「後殖民」等所面對的西方社會的問題幻化為中國社會的問題。結果恰恰是丟失了這些理論的精髓，磨滅、閹割了這些理論的鋒芒和革命性，反而使其喪失了合理性。所以，我們不能輕率地生吞活剝、生搬硬套一種外來的理論，更不能削足適履地以本土經驗（或乾脆無視這種經驗）來加以印證，而應經過一番艱苦的獨立思考、加工改造和有機消化，使之與本土經驗有機相契，使之作為一種新銳的武器來剖析本土的社會脈絡和問題。

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常識，確無深奧之處，只因一些「高深玄妙」者最易忘卻、拋棄的就是常識，所以只能、也只需以常識因應之。甚憾。

註釋

- ① 王明賢：〈紅衛兵美術運動〉，《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8月號。
- ②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7月4日。
- ③④ 見劉康：“Politics, Critical Paradigms: Ref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Modern China* 19 (January, 1993);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的轉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10月號；〈批評理論與中國當代文化思潮〉，《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4年4月號；〈全球化「悖論」與現代性「歧途」〉，《讀書》，1995年7月號。
- ⑤ 朱祖疇文，《論文集》，頁77。
- ⑥ 孫勵生文，《論文集》，頁39。
- ⑦⑩ 李景凡文，《論文集》，頁100; 128。
- ⑧ 程守箴文，《論文集》，頁17。
- ⑨ 陶謀道文，《論文集》，頁43—45。